

近代台湾银行在中国南部的银圆扩散与通货统一*

苏 颂 张 侃

内容提要:日本割占台湾后,为强化殖民统治,于1899年设立台湾银行。该行随即以台湾为基地,不断向中国大陆进行营业网络和业务扩张。台湾银行利用早期在华南广泛流通的日本银圆,发行以该种银币为准备金的银票,试图建立日系通货圈。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金融市场动荡不宁,台湾银行伺机怂恿日本大藏省铸造日本银圆,并依托其金融网络在华中、华南地区扩大日系货币的流通,以增强控制中国南部货币市场的力度,实现金融殖民目的。但受近代中国持续的抗议日本侵略的群众运动冲击,以及中国本土银行崛起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台湾银行以日本银圆统一中国南部货币的谋划最终走向失败。

关键词:台湾银行 日本银圆 货币市场 金融殖民 反日运动

日资银行是近代在华外国银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日本对中国进行金融渗透的战略支点。以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和朝鲜银行三大国策银行^①为代表,在东北、华北和华南地区相继发行各种日系货币,图谋将中国纳入日系通货圈,从金融上实现对中国的控制。海内外学界对抗日战争前日资银行在华金融活动的关注,主要以正金银行及朝鲜银行为主,^②对业务经营主要位于中国南部的台湾银行则少有着墨。台湾银行自1899年在台北成立后,便不断向华南及长江流域扩张势力,相继在厦门(1900)、香港(1903)、福州(1905)、汕头(1907)、广州(1910)、上海(1911)、九江(1912)、汉口(1915)等地设立分行,构建起广泛的经营网,并以此为依托在中国推广扩散日本银圆,相继在厦门、福州、汕头等地发行以该种银圆^③为准备的台银票,试图以日本银圆统一华南货币市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台湾银行在总裁柳生一义^④的带领下,趁中国社会动荡、硬通货紧缺之机,在华中、华南市场开始不遗余力地大规模推广日本银圆。这是以台湾银行为主导,举日本社会各界之力共同推动的统一南部中国通货的大规模金融渗透活动。不过,台湾银行的此次银圆推广计划最后并未成功。

[作者简介] 苏颂,温州大学华侨学院讲师,温州,325000,邮箱:susong0525@163.com。张侃,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厦门,361005,邮箱:zhangkan210@163.com。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近代中国国库制度研究(1905—1949)”(批准号:21CZS043)阶段性成果之一。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① 国策银行即政策性银行,是近代日本政府根据特殊法律设立的银行,也被称为特殊银行,其特征主要包括:(1)根据单独的特别法律而设立;(2)作为国策代行机关,重要董事的任免由政府负责;(3)拥有货币发行等多种特权,且受政府的特殊保护;(4)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督。参见企畫院研究會『國策會社の本質と機能』同盟通信社,1944年,24—27頁;石浜知行『特殊金融機關史論』育生社,1937年,4—12頁;张祖国:《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国策会社》,《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

② 燕红忠:《日本不同殖民集团对我国东北货币本位政策之争(1906—1933)》,《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燕红忠:《外国金融资本与地方金融势力的兴起——以奉天官银号的设立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3期;付丽颖,孙汉杰:《日元扩张与伪满货币制度的建立》,《外国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多田井喜生『大陸に渡った円の興亡』東洋経済新報社,1997年;小島仁「金本位制と日本の植民地幣制(1897—1920年)」『北星論集』第17号,1979年。

③ 日文中称之为“银圆”。为行文方便,后文中简称的“银圆”皆专指“日本银圆”。

④ 柳生一义于1901—1916年担任台湾银行第二任总裁,执掌台银长达15年之久,是近代台湾银行46年(1899—1945)历史中,担任总裁最久者。台湾银行正是在其统领下,不断向中国及南洋地区进行营业网络和业务扩张,成为近代日本推行“南进战略”的金融支柱。参见苏颂:《柳生一义与近代台湾银行的金融扩张》,《台湾研究集刊》2021年第3期。

学界对于台湾银行在南部中国扩散银圆、统一通货的计划及相关实践已有所关注,其中以日本学者为主。平智之在论及台湾银行对华借款之际,分析了借款与推广日本银圆之间的关系;^①须永德武受平氏启发,较为深入地阐述了台湾银行历次对华借款中涉及到的与银圆流通相关的内容。^②但二者关注的焦点是日本对华资本输出,银圆推广乃附带论述的问题。波形昭一在分析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金融政策时,也曾讨论台湾银行在华推广银圆的历史,但只是概述而言。^③《台湾银行史》作为战后由曾在台湾银行任职的多位行员组成的编纂委员会编写的志书,对银圆推广问题做了一定阐述。^④但该书史料来源大部分依然为台湾银行此前所编的、记载简略的志书,并未引用档案资料进行深入分析,书中的很多论述或语焉不详,或仅凭推断及个人记忆,对扩散银圆的诸多细节缺乏科学详细的考证。此外,熊昌锬曾论及近代日本银圆流入中国的历史;^⑤黄琼瑶在分析台湾银行在华货币发行业务时,对该计划也进行了初步论述。^⑥总体而言,学界既有研究成果对台湾银行在中国的银圆推广问题尚缺乏系统全面的探讨,或囿于资料所限,围绕该计划的诸多核心议题都未能作深入讨论。

本文利用日本外务省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藏“台湾银行所藏日治时期文书”以及台湾银行各年志书、时人著述、报纸等资料,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视角出发,以台湾银行在华推广日本银圆这一事件为考察中心,探讨台湾银行的银圆计划在与日本政府东亚政策相背离的情况下二者间的交涉和博弈、台湾银行推广银圆的策略选择和具体经过,以及在持续反日运动的冲击下计划最终破产等问题,力图在还原这一动态历史过程的基础上,揭示台湾银行攫取南部中国通货权的企图,深化近代日资银行在华金融侵略扩张之研究。

一、日本银圆在中国的早期流通

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颁布《新货币条例》,决定仿照当时横滨港同外国贸易时广泛使用的货币——墨银(墨西哥银元,又被称为鹰洋),大量铸造与其同等价值的银货,以削弱墨银在日本各通商口岸占据的主导势力,并取而代之。^⑦日本自主铸造银圆后,该银圆开始大量向外流出。因其龙形的彩纹较为精美,真假容易辨识,另因新铸磨损较小,在东南亚和中国华南市场广受欢迎,“在华南地区广泛流通,不仅在中国沿海各通商口岸,远至海峽殖民地、泰国、马尼拉等地方都得以使用,在这些地方作为法定货币流通。”^⑧1907年日本驻新加坡领事报告,在该地流通的银圆达七八百万圆,加上越南、马六甲、马来半岛,合计达到1600万至2000万圆。^⑨据统计,至1897年日本改为金本位制,其共铸造银圆1.65亿圆,到1898年7月31日银圆引换期限截止时,银圆自日本的纯输出额达到9950余万圆。^⑩

日本银圆发行之初,原为驱逐在日本通商口岸占据主导的墨银,虽最后未能成功,但日本政府却欲将之继续施行于中国,以其统一中国通货。在中国货币市场,日本银圆又被称为龙洋、龙银、龙番

① 平智之「第1次大戦以前の對中國借款と投資主體」國家資本輸出研究会編『日本の資本輸出——對中國借款の研究』多賀出版社,1986年。

② 須永德武「台湾銀行の中國資本輸出活動:自己資金单独借款を中心として」『土地制度史学』第35卷第2号,1993年;須永德武「第1次大戦期における台湾銀行の中國資本輸出」『立教経済学研究』第59卷第1号,2005年。

③ 波形昭一『日本植民地金融政策史の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5年。

④ 臺灣銀行史編纂室編『臺灣銀行史』大日本印刷株式會社,1964年。

⑤ 熊昌锬:《政府与市场作用视角下的近代外国银元在华竞争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6期。

⑥ 黄琼瑶:《日据时期的台湾银行1899—1945》,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1990年。

⑦ 臺灣銀行史編纂室編『臺灣銀行史』366頁。

⑧ 臺灣銀行編『臺灣銀行四十年誌』大日本印刷株式會社,1939年,225—226頁。

⑨ 臺灣銀行史編纂室編『臺灣銀行史』375頁。另可參考西村雄志「20世紀初頭の海峽植民地における通貨制度の展開」『歴史と経済』第47卷第4号,2005年。

⑩ 日本財政經濟研究所編『日本金融財政史』日本財政經濟研究所,1957年,63頁。

等。1874年,大藏省向日本内阁提出了设立上海交换所计划书,计划以大阪造币局为依托,铸造作为在华通货的银圆,以取代墨银的地位,从而握住东亚地区的贸易主导权。作为其交换机关和施行基地,先在上海设立交换所。随后,日本政府立即派员赴上海对墨银、日本银圆的流通状况进行调查,但最后认为上海流通的货币不是名目货币,而是称量货币,且中国民风保守,墨银乃中国人多年之喜好,银圆要取代其地位非常困难。反之,中国人将银圆熔铸成马蹄银的可能性非常高,届时只会损失铸造费。设立上海交换所的提案最终未获通过。^①

银圆受国际性金融货币政策的影响,在中国流通呈阶段性增长。1903年,新加坡开始通行新的殖民地弗银,禁止其他货币流通,原来在新加坡流通的日本银圆转向中国方面输出。^②日本于1897年开始实施金本位制,银圆随即成为废弃货币。为赚取利润,多达4078万圆的银圆“在上海及香港市场卖出”。^③1909年4月,台湾改为完全金本位制,银圆再次大量进入华南地区。

与日本银圆在华南的广泛流通相呼应,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银圆被日军携带进入战场开始在中国东北广泛流通。战后,随着日本控制了东北地区,为强化统治,日本政府全力扶植正金银行,在“满洲”以银圆为基础发行银票,并整理兑换战时发行的军票,力图在金融上统一东北的通货。但由于世界银价自1907年末开始暴跌、日俄战后日本国内金券伴随日本对东北移民和贸易的激增而大量流入“关东州”等地、1905年奉天官银号设立后发行的新式通货与银圆等日系通货形成激烈的对抗之势,^④以及日本在东北各方面势力围绕通货的金、银本位产生严重的对立和争执,^⑤多重困境下,最终导致1909年10月日本政府被迫放弃以银圆统一东北通货的企图,容忍在该地自由使用金、银券。此后,虽然正金银行继续致力于在该地推广银圆及银本位货币,但收效甚微,东北地区长期陷入日本不同殖民集团的金、银本位之争。^⑥

银圆在南部中国的流通,主要集中于南昌以南的厦门、福州和汕头等地区。1898年,根据日本驻厦门领事馆的调查,“眼下本地流通的银货,日本银圆最多,在漳、泉两府内部各地人民中颇具信用,流通颇为广大。”^⑦1907年8月,据该领事馆的报告,当年1—7月份7个月内,厦门港输入的日本银圆共计331250圆,主要来自新加坡、香港、台南、汕头四地,输入的墨银总计16500弗。可见在厦门主要的贸易货币为日本银圆,其次为墨银,且银圆的输入量要远远大于墨银。^⑧据福州日本领事馆的调查,1899年3月,“该港通用的银货为日本银、墨银及新加坡银三种,其流通额比例为日本银五、墨银二、新加坡银三。”^⑨1911年,台湾银行在广东通货调查报告中谈到:“(汕头)外国银货中日本银圆颇有势力,随处可见其流通,由此可知吾帝国在南清的势力不仅止于福建省。”^⑩1912年,根据台湾银行

① 臺灣銀行史編纂室編『臺灣銀行史』375—378頁。另參考岡田俊平「上海交換所設立案」『大隈研究』第7輯,1956年。

② 臺灣銀行史編纂室編『臺灣銀行史』375頁。弗銀即“海峽殖民地銀元”“新加坡銀元”,1902年因世界銀價暴跌,英國殖民政府隨即在海峽殖民地推行金匯兌本位制,同時在印度造幣廠鑄造成色為900的新銀幣輸入該地,作為唯一流通的法幣。可參閱吉田虎雄:《中國貨幣史綱》,周伯棣編譯,中華書局1934年版,第111—113頁。

③ 臺灣銀行「幣制改革後圓銀引揚及處分始末」『貨幣制度一(1)』“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台灣銀行所藏日治時期文書,編號T0868_01_03146_0706。以下同類檔案均簡稱“台灣銀行文書”,典藏地不再另注。

④ 大藏省編『明治大正財政史』第15卷 財政經濟學會,1938年,314—326頁。

⑤ 波形昭一『日本殖民地金融政策史の研究』175—176頁。

⑥ 燕紅忠:《日本不同殖民集團對我國東北貨幣本位政策之爭(1906—1933)》,《歷史研究》2018年第5期。

⑦ 上野專一「廈門ニ於ケル本邦圓銀ノ狀況ニ関シ在本地領事ヨリ報告之件」1898年5月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B11090566100。

⑧ 上野專一「本邦圓銀ニ関シ在香港上海天津廈門等各領事ニ訓令一件」1907年8月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B11090610500。墨銀的品位成色略高於日本銀圓,加之墨銀因需求量大而產生較高的升水,市場上基本每百弗墨銀可兌換101圓日本銀圓。

⑨ 豊島捨松「福州ニ於テ通用スル貨幣ニ関シ在本地帝國領事ヨリ報告ノ件」1909年3月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B11090575800。

⑩ 臺灣銀行『廣東流通貨幣』臺灣銀行內刊,1912年,2頁。

书记生清水孙秉对江西的调查,银圆在江西一带流通,主要集中在南昌以南,北部的九江则已经很少使用,即同福建、广东接近的地方,是银圆流入江西的主要路径。南昌为银圆、墨银的分界地,南昌以南为银圆的势力区,以北则为墨银的势力区。^①可见银圆在南部中国主要流通于南昌以南地区。

柳生一义鉴于银圆在中国华南市场拥有广泛的流通区域和巨大流通量,即欲以此为基础,继续推广以扩大其流通,进而统一华中和华南的通货。1905年开始,台湾银行在厦门发行以银圆为准备的银票,“在使本国银圆于中国各地广为流传的同时,另一方面扩大银圆支付票据的流通区域,以此统一中国各通商口岸的货币,消除因币制混乱在中国交易上的不便。”^②随后,台湾银行于1906年在福州、1909年在汕头又发行同等性质银票。台湾银行在华推广日本银圆和银票,二者互相兑换,共同流通,乃互为表里的措施。

柳生一义的银圆扩散思想,与此前大藏省的对华金融渗透企图可谓高度统一、一脉相承。随着1897年日本从银本位改为金本位制,随即停止铸造银圆,尔后虽暂时被允许作为台湾的货币而流通,但台湾也在1909年将银圆废止(金本位改革),中国市场的银圆补给之途彻底遭到断绝。且随着日本对东北侵略的深入,华南各地银圆大量向北流入,而现实中正在流通的银圆也因日渐磨损而遭改铸,导致其在华南地区日趋没落。此种情况的出现,对一心想要在华南扩大银圆流通的台湾银行而言,可谓是非常大的打击,“向来在华银票的扩张呈现逐年有望的趋向,现在作为其基础的银圆却逐渐消失,补给之途全部断绝的现状,对于本行宿望的实行真乃一大恨事。”^③

二、台湾银行发行银圆与大藏省的交涉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社会形势的动荡,致使中国银行、钱庄等大量破产倒闭。^④金融机构的严重信用危机,导致中国本土发行的纸币流通不畅,市场对于银货的需求量急剧增加,“金融界出现大恐慌,纸币下落,钱庄票据的无法流通导致清国市场信用交易遭到彻底破坏,硬货的缺乏日益严重”,^⑤进而直接促使墨银、英银的价格飙升,产生非常高的升水,供不应求。“人民争相以银货代之,致使银货的需求顿时增加,在清国流通的墨银、英银的价格瞬间腾贵,至十月末,上海的墨银价格已由变乱前的每百弗兑换七十五两,暴涨至八十三两。”^⑥柳生一义认为,若借此机会得以在华大规模扩散日本银圆,“对于贸易上的便利,国权的伸张,用兵的准备等诸多利益的获得都乃绝好机会。”^⑦因而开始积极筹划银圆推广计划。

10月30日,柳生即向东京分行经理、台湾银行理事山成乔六去信,要求其立即向大藏省进行交涉,以获得在大阪造币局铸造银圆的许可。在信中,柳生详细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形势:

此次清国发生大变乱,如果加以利用,乘机散布银圆,实乃千载一遇的好机会。如果动乱的波及日益广阔,一般经济组织的秩序日益紊乱,习惯、信用出现异动而被破坏,此时各种交易上对良好的硬货的需要会陡然增加,其结果必然导致一般硬货的不足,原料金属同货币之间的比价出现变动。……动乱一时之间难以平息,必然会导致军资的增加,硬货的需求也将随之日益增加。我国银圆流通的道路因此随之渐次打开,这是毫无疑问的。^⑧

① 清水孙秉「九江ノ通貨及金融事情」『金融事情一支那一(1)』1912年7月,台湾银行文书,编号 T0868_01_03055_0903。

② 大藏省編『明治大正財政史』第16卷 財政經濟學會,1938年,477頁。

③ 臺灣銀行「清國ニ於ケル日本圓銀流布ニ就ケ」台湾银行文书,编号 T0868_01_03139_0817。

④ 臺灣銀行編『臺灣銀行二十年誌』東京印刷株式會社,1919年,397頁。

⑤ 農商務省商務局「清國事變ノ我對清貿易上ニ及ホセル影響」『(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国事变書類 卷55止 雜報告(2)止(2)』1911年12月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C08041090300。

⑥ 「革亂と南清金融」『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1月1日,第2版。

⑦ 臺灣銀行「清國ニ於ケル日本圓銀流布ニ就ケ」台湾银行文书,编号 T0868_01_03139_0817。

⑧ 柳生一義「山成東京支店支配人宛」碧榕會編『柳生頭取の片影』東京印刷株式會社,1917年,114—116頁。

在柳生看来,辛亥革命为台湾银行在中国大规模流通银圆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而目前最为紧急之事,乃是说服日本政府由大阪造币局为台湾银行自由铸造该种银币。山成乔六根据指示随即向政府交涉,但大藏省理财局局长胜田主计却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1)日本如今已不再是银本位国家,伴随日俄战争等重大事件,日本的银矿已很少;(2)政府如今没有在中国一带扩散银圆的方针,唯独在东北,横滨正金银行作为当地的中央银行,依据敕令,发行代表银圆的银券。因此,除了此点可进行银圆的供给,其他方面绝对不可能获得银圆铸造的许可;(3)在品位及供给数量上,日本银圆皆不如墨银。^① 胜田认为,若同意台湾银行的银圆自由铸造计划,将破坏日本政府在中国东北的既往政策,加之正金及台湾银行在各自的营业范围内都将银圆作为商品进行买卖,银圆自由铸造将导致投机的危险。^② 在胜田的反对意见中,最刺激柳生一义的是第二点,它表现出日本政府对正金银行和台湾银行在政策上的不公平,明显偏袒于正金银行。此后,虽然山成乔六又进行了数次交涉,但大藏省的意见始终保持不变。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在对外扩张方面,一直存在海军势力所倡导的向华南、南洋扩张的“南进论”(海洋政策),以及陆军所倡导的向东亚大陆扩张的“北进论”(大陆政策)之争,且二者长期对立。1905年日俄战后,向朝鲜、中国东北等东北亚地区扩张的“北进政策”成为日本国策,“南进论”自此陷入沉寂。^③ 至此,整个日本的政策重心都聚焦于北方,“北进南守,重北轻南”,在金融上则着力扶植以中国东北为营业重心的正金银行,给予各种政策优惠,而台湾银行在南方的扩张,实则自日本大藏省至民间,都抱持一种“消极”态度,“无论是与之有关系的政府部门的意向,还是一般的舆论,都是完全冷淡的态度。”^④ 因此,大藏省的既定方针,只允许为正金银行提供银圆,台湾银行则不在政府的特殊“照顾”之列。

面对大藏省的否定与政策偏向,11月22日,柳生亲自给大藏大臣写了一封很长的私信,表达了其推广银圆的强烈愿望:

本行多年的宿望,在清国散布日本银圆,这次的时机绝不能让其溜走。……关于银圆散布,同一事件,但是根据南北的方位差异,其(政府)给出的说法也不同,仅仅只是单纯的将其是非的论据放在军队行动上的偏见。只知北清有正金银行,南清则不承认台湾银行,这是作为台湾银行当事者实在难以忍受的事情。向来我行在南清,并不是毫无事迹可观……我国政府的施政,将南清完全忘却,设施完全达不到,这是在我国贸易上和兴业上难以忽略的事实。如果持此偏见或决定此银圆散布之议,则如同被盲人背着涉河一般,其危险自不待言。^⑤

在信中,柳生一方面欲说服大藏大臣,证明台湾银行推广银圆对日本在华的扩张大有裨益,也是台湾银行多年的夙愿,趁中国爆发革命、通货不足之时,机不可失。但另一方面,信中也充满了抱怨和不满,表达了对日本政府“重正金、轻台银”的失望之情。

在致信藏相的同时,柳生又多方联络,最后迫使大藏省就此事于12月27日召开会议,柳生亲自从台北赴东京出席了会议。为促使大藏省同意计划,自山成乔六向大藏省初次交涉,至召开会议之

① 臺灣銀行史編纂室編『臺灣銀行史』383頁。

② 「台湾銀行ニ就テ・他一括」國立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藏『後藤新平文書』7—53。

③ 钟淑敏:《日治时期南进研究之回顾与展望》,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秘书处编:《中华民国史专第四届讨论会》,“国史馆”1998年版,第2063—2090页。

④ 大野恭平『柳生一義』大國印刷株式會社,1922年,91頁。

⑤ 柳生一義「某当局者宛」1911年11月,台湾银行文书,编号T0868_01_03165_0660。并见碧榕會編『柳生頭取の片影』142—155頁。在『柳生頭取の片影』一书中,编纂者故意隐去了此封信的收件人,台湾银行史编委会推断应该是写给大藏大臣的(臺灣銀行史編纂室編『臺灣銀行史』384頁)。而根据本文书资料,信中明确标注收信人为“山本藏相閣下”(山本达雄,1911—1912在任),可证明『臺灣銀行史』的推断无误。

前不到两个月时间内,柳生先后给政府要员、东京诸名士、友人、在外店长等写信达二三十封之多。^①并且柳生“就银圆问题百方奔走,1911年末,柳生氏在赴东京之际,在自基隆至门司三天之间的航海途中,关于本问题接到来自东京分行的电报多达六十余通。”^②可见其对在中国扩散银圆态度之坚决。柳生的多方交涉和动员取得明显效果,其主张得到了贵族院议员山本条太郎、目贺田种太郎以及由目贺田主导的云集了日本诸多名士的研究团体的支持,此外,与柳生关系密切的内务次官床次竹二郎也对此极力赞成,并为其多方游说,最终促使总理大臣西园寺接受了该计划。^③

在会议中,柳生将其主张进行了反复详细的陈述,经多方讨论,最后勉强获得通过。由大藏省首先向台湾银行提供100万圆银圆,以后每月供给50万。但作为铸造银圆的原料准备,台湾银行需依靠自身之力提供同等价额的银块。

在获得同意后,自1911年开始,台湾银行先后与日本内地的椿矿山、三井物产会社、三菱合资会社、古河合名会社以及藤田组等缔结了银块买入的特别契约。此外,台湾银行神户分行以及在华各店,均视市场情况买入银块,交给大阪造币局作为铸造的材料。^④

表1 1911—1916年台湾银行买入银块数量及铸造银圆枚数

年别	1911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合计
银块数量(贯)	4837.7	12658.2	11055.7	10692.8	18041.7	—	57286.1
银块价额(日圆)	659671	2000269	1156339	1332953	2257737	—	7406968
银圆铸造数(枚)	130000	2500000	1310000	1170000	1595000	580000	7285000

资料来源:根据臺灣銀行編「臺灣銀行十年後志」東京印刷株式會社,1916年,23—24頁;臺灣銀行編「臺灣銀行二十年誌」393頁整理而成。

依靠台湾银行买入的银块,大阪造币局1911年末即铸造了13万枚银圆,1912年达到最高的250万枚,此后略有增减,至1916年总计铸造728.5万枚。除了从造币局获得外,台湾银行还从政府借入了大量储存的银圆,1913年60万枚,1914年178万枚,合计238万枚。综合铸造及借入的数量,台湾银行于1911至1916年获得的银圆总数量共达到966.5万枚。^⑤

三、台湾银行推广日本银圆的多种举措

在获得稳定的银圆供给后,自1912年开始,台湾银行即先后在上海、九江、汉口、福州、厦门、汕头、香港等中国南部各地进行全面推广。为迅速占领市场,扩大流通量,台湾银行同时采取多种推广举措。近代在华的日本商人、公司众多,以其为媒介推广乃最快捷、有效和可行的办法,因而台湾银行首先寻求与他们的合作。

利用日本邮局是台湾银行在各地经常采取的措施。近代,日本递信省在中国各通商口岸普遍开设邮局以经营邮递、汇兑及邮政储蓄等业务。这些邮局在华业务广泛,“自中国向本邦各地的汇款额相当巨大,与地方社会业务往来频繁,具有重要势力。”^⑥台湾银行首先在上海与之达成合作协议,“自1912年8月开始,上海日本邮局接受银圆的兑换。日本邮局乃本行指定的日本金圆和银圆的兑换之所。”^⑦

但在华中地区,日本邮局起初却拒绝协助台湾银行。1912年7月,在九江的外务省书记生八木元八向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抱怨,称“长江沿岸各地所在的日本邮局均拒绝受授本邦银圆”,导致台

① 碧榕會編「柳生頭取の片影」111—187頁。此外,本书目录「第二手東」部分还曾标注「其他十數通略ス」。

② 大野恭平「柳生一義」146頁。

③ 臺灣銀行史編纂室編「臺灣銀行史」402—403頁。

④ 大藏省編「明治大正財政史」第16卷,484頁。

⑤ 臺灣銀行史編纂室編「臺灣銀行史」399頁。

⑥ 臺灣銀行編「臺灣銀行四十年誌」240—241頁。

⑦ 臺灣銀行文書系「南支南洋ノ通貨」臺灣銀行内刊,1924年,24頁。

湾银行的计划蒙受巨大损失,因此请求汉口总领事向外务省说明情况,与递信省达成相关协议。^① 在外务省的多次交涉下,自1913年6月1日开始,日本在汉口、长沙、沙市三个邮局,大冶、九江、武昌三个邮政收款所,以及汉口外国居留地办事处七个邮政营业点正式开始接受日本银圆,与台湾银行展开业务合作。^② 这对台湾银行在华中的银圆扩散而言,提供了极大帮助。

与正金银行的合作成为推广银圆的重要助力。汉口作为“中清的中央市场”,在长江流域的商贸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因而成为台湾银行流通银圆的重要目标区。但在计划开始时,台湾银行在汉口尚未开设分行,只能以临近的九江分行(1912年10月设立)兼顾;并且,当时银圆在汉口势力微弱,很少见其流通,因而困难重重。但台湾银行的目标是无论忍受多大损失,也要在汉口扶植银圆势力。^③ 为迅速打开市场,1913年3月,台湾银行九江分行同汉口正金银行分行缔结通汇协议,将该分行充作台湾银行兑换所,利用该行原有的信用基础和业务往来加速银圆推广。^④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银行就银圆扩散与正金银行的合作,在二者的关系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日本后起的国策银行,台湾银行在中国扩张布局的过程中,其业务及势力范围时常与正金银行发生竞争和冲突。就银圆推广而言,如前所述,柳生一义对日本政府政策上偏向正金的行为颇为不满。在1912年7月台湾银行行员提交的一份汉口扩散银圆方案中,作为当地唯一的日本金融机关,该行员却设想了正金银行接受与不接受帮助兑换银圆两种情形,可见对正金银行并不信任。^⑤ 然而此次两大银行达成合作,当时日本驻汉口领事也十分感慨:“向来正金银行及台湾银行,其营业上在中国方面表现出较为反目的姿态。台湾银行作为后进的特殊银行,对正金银行一直保持大的远虑。如今缔结了通汇契约,……此协谈的圆满进行,致使两行向来的态度就此焕然一新,打开了新的领域。”^⑥ 两大银行自此联手对华展开金融渗透和入侵,对中国金融业发展无疑带来更大阻碍。

取得与驻汉口日本军方的合作是台湾银行的既定计划。辛亥革命爆发后,柳生即极力煽动以保护日侨为名向中国出兵,并谋划在军队中强制使用银圆及银票,借助驻军军费来达成流通银圆的计划,“如果今后军队出动之时,在地方上强制使用银圆及支付票据,不仅为台湾银行打开了兑换的道路,本行在清各店,借助这次的事变机会,基础也将日益巩固。”^⑦ 而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在积极策动向汉口出兵以扩张其在长江流域的势力,并于1912年1月正式派日本陆军侵入汉口。^⑧ 以此为基础,1913年,台湾银行与驻汉口日本陆军派遣队达成合作,驻军每月的支出经费主要使用银圆,其它购置品等也均以银圆为标准。^⑨ 日本陆军在汉口驻扎长达10年之久,从而成为台湾银行在华中扩散银圆的稳定渠道。

与中国政府合作,通过提供借款,借地方政府财政之手是台湾银行扩散银圆的重要举措。“本行向来对各地官府进行帮助,此时通过官府各种纳税金使用银圆,对于银圆的普及将是最便捷的手段。”^⑩ 促进银票流通与银圆扩散乃表里一体的措施,一直以来台湾银行极力通过借款扩散银票,以达到推广银圆的目的。“支付票据主要以银圆为代表,为了达到支付票据增发的目的,忍受多少损失都

① 八木元八「在九江本邦郵便局ニテ日本円銀授受開始方ニ関スル件 同七月」1912年7月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B12081178400。

② 犬塚勝太郎「本邦郵便局ニ於テ日本円銀授受方ニ関スル件 同六月」1913年6月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B12081180500。

③ 芳沢謙吉「台湾銀行漢口ニ円銀輸入計画ノ件」1913年4月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B11090606800。

④ 芳沢謙吉「台湾銀行漢口ニ円銀輸入計画ノ件」1913年4月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B11090606800。

⑤ 「漢口ニ圓銀流布ニ就キノ私見」1912年7月29日,台湾银行文书,编号 T0868_01_03165_0660。

⑥ 芳沢謙吉「台湾銀行漢口ニ円銀輸入計画ノ件」1913年4月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B11090606800。

⑦ 柳生一義「支那ニ對スル日本圓銀流布案(1911年12月29日臺銀茶話會席上ニテ)」碧榕會編『柳生頭取の片影』38—39頁。

⑧ 李少军:《民国初期在汉口之日本陆军派遣队述略》,《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

⑨ 芳沢謙吉「台湾銀行漢口ニ円銀輸入計画ノ件」1913年4月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B11090606800。

⑩ 臺灣銀行「清國ニ於ケル日本圓銀流布ニ就ケ」台湾银行文书,编号 T0868_01_03139_0817。

可以,努力推进银圆的流通。”^①早在台湾银行成立翌年即1900年,在与福建布政使周莲进行20万元的借款交涉时,台湾银行即提出了在福建省内将台银票作为公私出纳使用的货币等条件,试图依靠政府财政加强台银票的流通,但最终因借款条件太过苛刻而遭中方拒绝。^②1906至1911年间,在对福建布政使的7次借款中,台湾银行每次均以日金作为支付手段。^③1912年在筹划设立九江分行时,台湾银行再次强调借款对扩散银圆的重要性,“可以利用眼下中国财政匮乏的时机,通过借款等形式,促进日本银圆的流通。”^④1913年2月,在江西南浔铁路第二次借款中,台湾银行以银票提供了500万日圆中的50万圆。^⑤

继厦门、福州和汕头之后,台湾银行又先后在九江(1914)、汉口(1915)及上海(1915)发行了银票。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大隈重信、松方正义的主导下,至1896年前后,成功实现了从传统纸币向近代信用货币转换的金融革命,建立起由中央银行发行可兑换纸币的金融制度。^⑥1897年日本开始实行金本位制,同年3月,日本政府以第三十八号法律公布《台湾银行法》,赋予正在筹建中的殖民地中央银行——台湾银行以纸币发行特权。^⑦但鉴于当时台湾币制混乱,且民众交易长期习惯用银,将金本位制度延长至台湾,为当时的台湾经济状况所不许,故“决定台湾暂时一面以金币计值,同时仍像过去一样通行银圆。”^⑧在此形势下,1899年3月,日本政府进一步以第三十四号法律公布《台湾银行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台湾银行发行“券面金额银圆一枚以上的银行券”,并且可随时兑换日本银圆。台湾银行开业后不仅在台湾发行可兑现的银票,同时于中国大陆扩张过程中也发行此种台银票。而中国自晚清以来,伴随货币与货币制度的变革,银本位制逐渐在中国建立,各个新式银行及各省官营钱局等纷纷大量发行钞票,如1897年成立的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即发行可兑换银两和银元的两种钞票,“是为吾国近代银行发行兑换券之嚆矢”,^⑨促使纸币的流通量大规模增加。但于此同时,近代以来,外资银行纸币因其币值稳定,信用良好,相较中国本土纸币而言,人民更乐于使用。自1905年于厦门开始,台湾银行在华各分行相继大量发行以日本银圆为准备的银票,此乃因应近代中国币制变革、可兑现纸币发行及流通不断增长的时势,以及市场普遍偏好外资银行纸币的情形,进而扩大银圆流通的精心筹划之举。

通过台湾银行各营业点多种措施并举的推广,银圆扩散取得了一定成效。根据1916年11月的调查,在厦门,银圆的流通占比为55%,远高于英银的30%以及墨银的10%,成为厦门市场占统治地位的通货;1913年9月对福州的调查,银圆在当地流通量依然占据第一位,凌驾于墨银之上,是与英银并列需求最多之硬通货;1915年4月对汕头的调查,当地银圆与英银、墨银的流通比例大致相当,不分伯仲。^⑩1917年中国银行厦门分行的报告显示,“查发行国币,本为我行之责,自应实力奉行。惟厦门一埠,向无生银交易,均系通用日本龙洋,我国各省所铸之龙洋并不通用。”^⑪

① 「營業要項續キ支那(秘)」1913年10月『覺書及營業要項』台湾银行文书,编号T0868_01_01295_0562。

② 「对支借款關係雜件/福建省ノ部 第一卷 1. 許總督借款申出 自明治三十三年十二月」1900年12月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B04010724200。

③ 「对支借款關係雜件/福建省ノ部 第一卷」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B04010724000。

④ 「台湾銀行九江出張所設置ニ関スル件」『台湾銀行/分割1』1912年4月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B10074150700。

⑤ 臺灣銀行史編纂室編『臺灣銀行史』324—325頁。

⑥ 何平:《传统中国的货币与财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22—226页。

⑦ 「御署名原本・明治三十年・法律第三十八号・台湾銀行法」1897年3月30日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A03020272900。

⑧ 周宪文:《台湾经济史》,开明书店1980年版,第407页。台湾从1904年6月开始实行金本位制改革,至1911年4月才最终完成,实现了与日本本土货币制度的统一。

⑨ 张家骥:《中华币制史》,民国大学1925年版,第101页。

⑩ 臺灣銀行調查課『南支南洋ノ通貨』臺灣銀行内刊,1920年,64,53,79頁。

⑪ 《民国六年二月廿二日厦市政总处书字第8号函》,《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行史资料汇编》编委会编:《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行史资料汇编(1915—1949)》(上),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台湾银行从日本国内获取的银圆,均直接送往中国及香港各店以供其支付使用。根据统计,1915年12月末,各店的银圆存余数量,上海分行2000枚,福州分行20万枚,香港分行10万枚,计30.2万枚。^①1917年3月末,各店所有数量,台北本店5114枚,上海7670枚,九江11583枚,汉口41972枚,福州56656枚,厦门132000枚,合计254995枚。^②从数量分布来看,银圆在华主要流通地为厦门和福州等华南地区,这与自1912年初大规模推广之前的分布状态保持一致。而此前银圆流通较少的地域,如九江、汉口等地,流通量明显增加,这是台湾银行推广的效果。

表2 1905—1921年台湾银行在华银票发行额统计表 单位:日圆

年份	上海	厦门	汕头	福州	九江	汉口	合计
1905	—	31089	—	—	—	—	31089
1906	—	32984	—	4059	—	—	37043
1907	—	70189	—	9357	—	—	79546
1908	—	162111	—	5014	—	—	167125
1909	—	135487	22932	5589	—	—	164008
1910	—	287982	15583	2968	—	—	306533
1911	—	339581	24763	5986	—	—	370330
1912	—	523956	42773	4464	—	—	571193
1913	—	730076	47123	4637	—	—	781836
1914	—	999560	71436	5548	18375	—	1094919
1915	5000	194965	47884	1755	1610	28967	280181
1916	1147	272831	75618	2231	116	233621	585564
1917	100	513870	123300	2213	26	339361	978870
1918	40	1596873	121989	2224	5	471185	2192316
1919	—	184999	62524	457	—	150597	398577
1920	—	52512	53350	278	—	214834	320974
1921	—	27004	35139	257	—	188744	251144

资料来源:根据臺灣銀行編『第十六次臺灣金融事項參考書』小塚印刷工場,1922年,5頁整理而成。

银票是银圆的纸币表现形式,以银圆为准备,且台银票始终可随时兑换此种银币,具有固定的兑换性,^③因此银票的发行额基本可代表银圆的流通额。从表2可见,1918年银票的发行额达到最高的219万余圆,而在同一年,厦门的发行额也达到最大值,近160万圆,占当年总流通额的73%。关于银圆的具体流通数额,《台湾银行四十年志》中记载:“本行散布的银圆,1917、1918年达到最高的七百余万圆,支付票据发行额也达到三百余万圆”,^④基本与银票的流通额变化趋势一致。

四、台湾银行统一通货计划的失败

日本银圆在中国的推广谋划并不顺利,面临多重困难,尤其是不断受到中国民众因日本不断侵华而持续爆发的反日运动的冲击,其中五四运动更是对该计划带来致命打击。此外,中国本土银行的不断崛起壮大,也极大程度地抑制了银圆对中国的渗透。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机进攻青岛并侵占德国控制下的山东。此举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引发大规模反日运动,台湾银行厦门分行、福州分行均遭大量挤兑,发行的

① 臺灣銀行編『臺灣銀行十年後志』25頁。

② 臺灣銀行史編纂室編『臺灣銀行史』399頁。

③ 自1897年《台湾银行法》颁布开始,其第八条即明确规定了台湾银行券的可兑换性。虽然此后该法历经多次修订,但在台银票彻底退出中国市场前,该属性始终予以保留。参见臺灣銀行編『臺灣銀行四十年誌』附錄,35—36頁。

④ 臺灣銀行編『臺灣銀行四十年誌』228頁。

银票流通量大量减少。^①而后,日本政府强迫袁世凯签订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将尚未平息的抵日情绪再次推向高潮。福州、厦门两地再次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并拒用日本钞票,“日货排斥起矣,禁用敌人通货之中国文檄文散布各处,台湾银行之取现者,今尚不绝……福州自三月二十六日起,台湾银行发行之支票,市场一部[度]全不交易。”^②在此影响下,日本银圆流通的核心区——厦门的银票发行量急剧下降,从1914年的999560圆暴跌至194965圆,降幅达80%,以至于对整个银圆在华流通都遭到严重打击。面对此局面,柳生一义也无可奈何的承认“作为海外银行基础渐备,将来会承受很大的负担,对此颇为遗憾。”^③1915年5月31日,上海及九江两分行被迫同时停止发行银票。^④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民众纷纷抵制日货,拒用日钞,与日本实行经济绝交。作为日资银行在华的代表,台湾银行首当其冲。在上海,正金、台湾两行遭大规模挤兑,中国金融机构纷纷与之断绝往来,“自抵制以来,本埠日货所受影响如左:正金、台湾之钞票兑出者,已达相当之额。台湾银行之福州、厦门等分行,正在赶紧接济。”^⑤“钱庄业对凡与日本有交易关系者则不与之交易,正金与台湾两银行之纸币几乎完全不能流通。”^⑥在汉口,市场不再接受日钞,“汉口各团集议先以抵制金融为入手,与日商结清往来,均用现洋。”^⑦在九江,台湾银行亦受到挤兑,“5月12日,日本的纸币在九江市面上已不通行。”^⑧在华南地区,“十七号下午厦门钱庄公会开会会议决不收换日本纸币,以后不与该两银行(台湾银行、新高银行)往来。……厦门民情之愤慨于此可见一斑矣。”^⑨

国人大规模的爱国抵制运动将台湾银行的扩散银圆计划推向破产边缘。1919年台湾银行在银票发行额,从1918年的219万余圆,暴跌至1919年的不到40万圆,减少了82%,而此后更是持续大量减少(参见表2)。1921年,厦门分行“受到排日气势的影响,台湾银行的兑换券被迫收回十之八九。”^⑩在上海,台湾银行纸币发行额从1919年5月1日的593000弗,骤降至12月31日的35000弗,降幅达94%,“现在的余额和根据废品焚烧等回收的金额几无差别。”^⑪挤兑风潮以及拒用日币,使得银圆及银票同时失去了流通的可能性。

而在此后,中国又相继爆发了五卅运动以及因“九一八”事变而掀起的反日浪潮,给银圆扩散侵略计划继续带来毁灭性打击。在福建省,到1932年,台湾银行银票几乎已完全退出,在市场上毫无流通,“台湾银行券除了日本人、台湾人及钱庄之间以外,几乎不通用。”^⑫在上海,“正金、台湾等行之钞票,自中日交涉,拒绝行使,市上且已绝迹。”^⑬

银圆流通失败与中国本土银行的不断崛起、信用的日渐巩固也有深厚关系。“中国银行业的基础逐步稳固,中国国民民族观念日益浓厚”,^⑭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台湾银行统一南方货币的企图。伴随中国民众不断高涨的爱国热情,人们纷纷拒用外钞而选择本国货币,促使本土银行趁着良好的

① 臺灣銀行編『臺灣銀行十年後志』18頁。

② 黄远庸:《黄远生遗著》第2卷,周谷城主编:《民国丛书》第2编99,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327页。

③ 碧榕會編『柳生頭取の片影』327頁。

④ 臺灣銀行編『臺灣銀行四十年誌』附錄,16頁。

⑤ 《抵制声中之日货状况》,《申报》1919年6月3日,第11版。

⑥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1页。

⑦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22页。

⑧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印:《江西党史资料》第9辑《五四爱国运动在江西专辑》,1989年印行,第19页。

⑨ 《厦人对于青岛问题之愤慨》,《申报》1919年5月24日,第8版。

⑩ 外務省通商局「福建省事情」『各国事情関係雑纂/支那ノ部/福州 第二卷』1921年6月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B03050361200, 39頁。

⑪ 參謀本部「単行書・陸乙六五・大正八年五月以来排日運動ノ為日本ノ被リタル影響」1920年5月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A04017277600。

⑫ 參謀本部「付表第2 南支那地方別流通貨幣一覽表」1933年10月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C13032622300。

⑬ 杨荫溥:《上海金融组织概要》,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465册,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⑭ 濱田峰太郎『中国最近金融史』東洋經濟新報社,1936年,168頁。

经营环境日益壮大,中外银行间的实力此消彼长,“1926年时中国金融力量的发展已基本可以与外国在华银行业相抗。”^①根据日本驻福州领事馆的报告,“1915年6月1日开业的中国银行分行,乃乘排日的气势而产生。1919年9月开业的福建银行分行亦是如此。前者乃中国的中央银行,台湾银行及汇丰银行向来力压之,但时逢台湾银行兑换券被迫回收,各地方始见中国银行兑换券的流通。”^②在厦门,民众于抵制日钞过程中,纷纷拒用台银票而替换为中国银行券,“台银券以日本银圆为代表,中国银行券以袁世凯银元为代表。1919年4、5月间,几乎全部的台银券都被中国银行券将其地位置换。然而追根究底,并非由于二者信用的差异,乃是因为政治的原因。”^③

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开始铸造袁世凯银元。此种银币与日本银圆及其它外国银元相比,品位差距较小,于各地流通甚广,行用无阻。^④在反日运动中,民众纷纷选择使用该银币而拒用银圆,伴随“中国的内乱暂时告一段落,墨银的价格也随之下跌,同时,因为民国大洋元的铸造,在长江流域对于银圆的需要几乎停止,银圆的推广变得非常困难,甚为遗憾。”^⑤五四运动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根据台湾银行于1922年9月针对厦门市场的调查,当地银圆的流通比例已降至6%,而1912年这一比例还高达55%,取而代之的则是袁世凯银元,比例高达93%,占据绝对优势。^⑥可见反日运动的影响及中国货币的冲击,银圆、墨银等外国银币已遭弃用而势力大减。

此外,近代外国银币墨银等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势力以及广泛的市场占有率,也极大地挤压了银圆的推广空间。1913年5月,根据日本驻汉口领事的报告,汉口墨银势力强大,“将它们驱逐,单独将银圆作为通货乃不可能之事”,并且,因银圆市场兑换率极不稳定,给市场交易带来不便,因此“即使并行流通也不是容易之事”。^⑦在上海市场,情形亦是如此,“日本银圆与墨银欲达到同等程度的受授,在当下乃至难之事。”^⑧

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台湾银行在华银圆推广计划走向失败。1925年1月14日,台湾银行总裁中川小十郎(1920—1925在任)在给外务省通商局长佐分利贞男的一封电报中,即明确谈到:“作为本行业务的一端,尝试将日本银圆向华中及华南进行扩散,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银圆的推广未能成功而中止。”^⑨1933年3月8日,国民政府颁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明确规定“银本位币之铸造,专属于中央造币厂”,^⑩依法将银元的铸造权收归国有。伴随中国开始自主制造一元银货,以及中国银行发行的纸币流通日渐兴盛,“银圆逐渐失去影响,伴随着本行支付票据的渐次回收,1933年末,银圆已完全退出流通。”^⑪至此,台湾银行在华南及长江流域推广了长达二三十年之久的日本银圆,完全退出中国市场,以银圆统一南部中国货币的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

① 朱荫贵:《抗战爆发前的外国在华银行——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② 外務省通商尙「福建省事情」『各国事情関係雑纂/支那ノ部/福州 第二卷』1921年6月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B03050361200,39頁。

③ 外務省通商尙「福建省事情」『各国事情関係雑纂/支那ノ部/福州 第二卷』1921年6月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B03050361200,40頁。

④ 徐裕孙:《国币条例公布后之银元进化观》,《银行周报》第8卷第9期(1924年)。

⑤ 江崎真澄「柳生先生の横顔」吉野小一郎編『柳生先生を憶ふ』大正社印刷所,1932年,166頁。

⑥ 臺灣銀行文書系『南支南洋ノ通貨』66頁。

⑦ 芳沢謙吉「台湾銀行出張所出願 同伴 同四十五年四月」『清国上海外七港ニ於ケル本邦壹円銀貨流通額調査一件』1912年4月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B11090605600。

⑧ 臺灣銀行總務部調査課「對岸各地ニ於ケル圓銀視察報告書」1913年5月,台湾银行文书,编号 T0868_01_03165_0660。

⑨ 中川小十郎「敝行九江支店再設ニ関スル件」『本邦銀行關係雜件/台湾銀行之部/台湾銀行/分割3』1925年1月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B10074150900。关于台湾银行停止推广银圆的时间,台湾银行史编委会推断认为,在国民政府“废两改元”以及1935年“法币政策”出台后,台湾银行随即停止了支付票据发行以及银圆流通(臺灣銀行史編纂室編『臺灣銀行史』401—402頁)。而根据上引中川小十郎的电报可知,早在1925年台银已宣布银圆扩散计划失败并可能已停止推广,只是并未收回仍继续兑换流通而已。

⑩ 张家骥:《中国之币制》,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85页。

⑪ 臺灣銀行編『臺灣銀行四十年誌』228頁。

五、结语

近代以来,日本银圆被台湾银行作为对华进行金融渗透,以攫取货币控制权的侵略工具,“实际上银圆推广之事,一方面是出于经济上的必要,同时,另一方面也属于政治的问题。”^①辛亥革命爆发后,柳生一义试图借中国社会动荡,通过动员日本在华各方力量大肆扩散银圆,图谋统一华中、华南的货币,将这些地区纳入日系货币圈,进而获取货币支配权,实现对中国的金融殖民。作为日本的国策银行,台湾银行肩负对华特殊使命,在中国大力推广日本银圆成为其对华金融侵略的实践。此计划是在日本对东亚政策,以及日本国内金融现状难以满足其实施条件的背景下仍极力展开的,由此,充分展现了台湾银行作为日本对华侵略金融尖兵和协力者的角色,以及殖民地银行的强烈金融扩张性。

在近代中国金融市场上,外国银元因其重量及成色得到认可,品质可靠,节省了检验的时间和费用,从而造就了高于其本身价值的价格,形成较高的升水,化身为“套利资本”。^②中国的这种“套利型”货币市场,引起英、美、日、法等多国觊觎,各国均投放货币,试图从中国货币市场获取利益。但各国货币之间为争夺中国市场产生了激烈竞争,且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货币主权”的认识不断加深,通过不断的币制改革,逐渐确立起国家在货币发行和管理中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伴随中国持续爆发的反日运动,中国的民族意识不断觉醒。对在华外资银行的抵制,不仅给各国的货币扩张计划接连带来直接的沉重打击,而且对中国本土银行业信用的巩固、势力的发展都带来极大推动,“因民智日开,人民渐知爱国一般心理,遂有倾向内国银行钞币之势”,^③从而在根本上为驱逐外国货币奠定了坚实基础。种种因素,或是英、美、日等国谋求统一中国货币难以成功的重要原因。

The Bank of Taiwan's Silver Yen Coins Diffusion and Currency Unification in Southern China in Modern Times

Su Song, Zhang Kan

Abstract: After Japan seized Taiwan, in order to strengthen its colonial rule, the Bank of Taiwan (BOT) was established in 1899. The bank immediately used Taiwan as its base and continued to expand its business network and business to mainland China. The BOT used Japanese silver yen coins that were widely circulated in southern China in the early days to issue silver yen notes with the silver coins as reserves in an attempt to establish a Japanese currency circle.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Chinese financial market was turbulent. The BOT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encourage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of Japan to cast Japanese silver yen coins, and rely on its financial network to expand the circulation of Japanese currency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China,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the currency market in southern China,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financial colonization. However,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continuous anti-Japanese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rise of domestic banks in China and other factors, the BOT's plan to unify the currency of southern China with Japanese silver yen coins eventually failed.

Keywords: The Bank of Taiwan, Silver Yen Coins, Currency Market, Financial Colonization, Anti Japanese Movement

(责任编辑:高超群)

① 臺灣銀行編『臺灣銀行十年後志』21頁。

② 熊昌銀:《良币胜出:银元在近代中国市场上主币地位的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6期。

③ 杨荫溥:《上海金融组织概要》,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465册,第195页。